

薩繆爾·法布爾：古巴革命的未來

2016-03-19 薩繆爾·法布爾

自從勞爾·卡斯特羅 2006 年掌權並宣布改革以來，古巴政壇慢慢開始有了一些新的趨勢與爭論。然而這個國家左翼的未來將如何，仍然難以預料。



美聯社照片/費爾南多·萊斯卡諾 (Fernando Lezcano)

—

古巴正處於十字路口。

在推翻了巴蒂斯塔獨裁政權五十五年之後，當年的革命元老相繼去世，而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將如何前進依舊不很明朗。它會經歷東歐國家那樣的資本主義“休克療法”嗎？還是會像中國和越南那樣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政治自由的擴大和對異議分子的寬容，會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伴隨著經濟自由化的進程而出現嗎？社會主義民主也許很難在古巴實現，如果能的話，這對這座島上新生的批評左翼又意味著什麼呢？

不管怎樣，勞爾·卡斯特羅自 2006 年掌權以來便承諾改革，古巴政壇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爭論。儘管我們對這些思潮所知有限，而且很少有古巴人願意公開討論他們的政治傾向，但我們仍然可以勾勒出島上變化中的政治格局。卡斯特羅的改革進程推動了大多數長期政治犯的釋放，正視並努力緩和了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還推動了出入境的進一步自由。這些改革措施有著類似的特徵：行政規則的放寬，對公眾意見的讓步，同時不承認任何獨立於政府裁量權之外的

公民權利，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與經濟自由化。當然，這些舉措絕不可能帶來美式民主，因為那會動搖古巴共產黨對於權力的壟斷。

卡斯特羅經濟改革的重點在於試圖採用“中越模式”來恢復古巴經濟的活力，這種模式是一種一黨專政的國家資本主義，掌握了銀行業等國家經濟的戰略部門，同時與國內外的私有部門分享其餘部分。然而古巴的經濟自由化卻不像越南與中國那樣順利，阻力並非來自基層，反而來自於擔心自己的權力被侵蝕的官僚階層。而這也日益成為古巴學術界中間的熱點話題。

古巴社會科學家卡米拉·哈內克（Camila Piñeiro Harnecker）特別提到了來自於“集權主義者”的影響，這些人往往是中層的管理人員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他們擔心失去工作，擔心失去通過腐敗牟利的機會。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傾向於支持繼續完善國家社會主義。儘管哈內克僅僅將這個範圍描述為中層的官僚階層，而且沒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他的分析仍適用於那些權力鏈條頂端的高級幹部，例如近來被視作勞爾-卡斯特羅繼承人的強硬派，何塞·拉蒙·馬查多·文圖拉（José Ramón Machado Ventura）。

除了中層管理人員對於“中越模式”的擔心之外，我們對於這個國家權力結構中其他重要部門對於這些改革的看法，以及全國人民對於這些改革的看法都知之甚少。而那些國家重要企業（包括合資企業）的管理者與技術人員的觀點，無論他們是否隸屬於軍方，卻都是不難預料的。

就像他們那些東歐國家的同行一樣，這些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都是勞爾·卡斯特羅改革進程的積極擁護者，強烈支持古巴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有些管理人員的確明確這樣表示，但實際的改革進程顯然更加溫和：允許國有企業保有 50% 的利潤用來調整資本結構，小規模投資與工資上漲的自由決策權。這些措施是古巴共產黨 2012 年的一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還包括更大尺度的改革（目前大部分未實現），例如部分地放開定價權，以清算、私有化或改制為股份公司的形式清除掉部分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

卡斯特羅的經濟改革已經從古巴經濟研究中心（CEEC）的一群經濟學家那裡獲得了製度上的支撐。儘管他們認為這個改革計劃的範圍有限，但仍認為這是邁向建立國家主導的混合經濟的重要一步。這些支持者中最突出的兩位是 Omar Everleny Pérez-Villanueva 和 Pavel Vidal Alejandro。在同樣工作於 CEEC 但卻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哈內克看來，這些“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主義的首要目標。CEEC 也暗示過相比社會主義管理，私人式的資本主義管理更有優勢。

哈內克談到，在這些“經濟學家”眼裡，受利益驅使的自主經營企業能夠最有效率地協調各種經濟活動。他們認為私有化經濟帶來的種種後果，無論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對於弱勢群體的進一步忽視，還是日益嚴重的環境惡化，都可以得

到有效的解決。他們提出用合理的稅收制度來削弱貧富差距，並以立法的形式來保護消費者、工人與環境——這一立場使我們想起歐洲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黨人。

哈內克還提到，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在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當中很是流行，他們希望改革帶來管理自主權的全面放開，這樣“計劃經濟”的成分便被消除乾淨，私有製也會得到恢復。他們與 CEEC 是否有直接關係還不清楚，但 CEEC 的“經濟學家”們在向古巴的政治-學術機構兜售贊成市場的過程中的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也使得這群人被捲入官僚的明鬥暗爭當中。

哈瓦那大學的校長認為 Omar Everleny Pérez-Villanueva 對於古巴當前經濟體制的批評有所失當，隨後便阻止他前往華盛頓參加 2013 年拉美研究協會的會議，而幾位和他持相同觀點的同事卻得以前往。而作為計劃與經濟部長 Marino Murillo Jorge 的經濟顧問，Pérez-Villanueva 似乎並不怎麼買賬，與 CEEC 的幾位同事繼續我行我素。2013 年 6 月，他出現在古巴電視台，主持一場以“古巴的經濟與企業管理”為主題的研討會。

二

幾年之前，還很難相信天主教會會成為古巴政治生活的主要角色。在教會的歷史上，它在古巴的力量一直都是比較弱小（就拉美標準而言）的。而勞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政府則向教會做了一系列讓步，允許它組織宗教遊行，建立起網絡化的組織，發行新聞簡報、雜誌，建立小型教區並發行教團出版物。此外，自 2011 年以來，卡斯特羅還允許天主教會掌管菲力克斯·巴雷拉文化中心，這是政府的批評者們可以公開發表他們意見的少數地方之一。這個中心還和一個西班牙天主教大學一起培訓古巴未來的企業家。

人們或許琢磨不透古巴政府究竟從這些讓步中獲得了什麼，但毫無疑問的是天主教會從中收穫頗豐。教會是一個管理極為高效的團體，其組織程度僅次於軍隊。它從戰略、戰術各個層面上考慮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試圖成為國內一支重要的道德力量，由此它以一個“中立”的仲裁者的形象試圖凌駕於古巴所有的社會、政治利益衝突之上。

為此，教會試圖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長期以來古巴文化傳統的守護者，結合流行的古巴黑人的信仰，例如對於科夫雷仁愛聖母、約魯巴傳統的古巴守護神 Ochúnin 的崇拜（同時又試圖讓自己與異教崇拜劃清界限），突出古巴文化的特色。在披上守護者外衣的同時，它也在努力掩飾一系列棘手的歷史與政治問題，比如它對於西班牙統治尤其是最後一次獨立戰爭期間的激進支持，以及革命政府早期它和右翼反對派的關係。

古巴的天主教階層希望看到一個有著深厚天主教傳統的重要黨派來帶領古巴走向轉型，就像歐洲和拉美的一些基督教民主黨派所做的一樣。但教會也很清楚，在採用了獨裁的中越模式的古巴，這樣一個黨非但沒有流行的土壤，也無法發揮其作用，而這個黨派實際上也已經在流亡當中了。因此它選擇追求更現實的目標，推動禁止墮胎、離婚的天主教社會議程的實現，在高校當中擴大影響力，在公共學校推廣宗教教育——自 20 世紀上半葉的古巴共和國時期起，天主教集團就已經在追求這些目標了。

沿著其一貫模稜兩可的多變政策，教會自 2012 年以來就一直出版菲力克斯·巴雷拉文化中心的官方刊物《凡人空間》(Espacio Laical)，為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主義以及新的批判左派和 CEEC 的經濟學家們提供輿論陣地，卻也偶爾對那些拒絕與古巴政府對話而且（有可能）與美國在哈瓦那的利益部門合作的異見分子發生點摩擦，但他們也資助並出版那些“古巴新家”（“古巴新家”是一個《凡人空間》旗下的社會、法律研究團隊，可參考 <http://translatingcuba.com/a-dreamed-of-possible-and-future-cuba-laboratorio-casa-cuba-proposal-catholic-archdiocese-of-havana/>）組織下的各種民主提議。

身為一個缺乏經驗的教會發言人，《凡人空間》的一個編輯 Lenier González Mederos 在雜誌中含蓄地暗示過一份教會與軍方之間的政治協議。他認為雙方在未來 200 年內都會互不侵犯，並聲稱“軍方和教會都有著強烈的愛國心與道德責任感，必定能保衛並推動古巴迎來一個最好的未來”。

在《凡人空間》營造出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輿論的同時，哈瓦那教區也推出了他們的官方刊物《新詞彙》(Palabra Nueva)來散佈許多保守主義的觀點。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基調，這個雜誌的編輯，哈瓦那教區的官方發言人 Orlando Márquez 在他的文章《財富並不可怕》中宣稱，一個富裕階層出現是可喜可賀的，因為這體現了國家經濟的繁榮，而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也並不會帶來太多問題。作為其保守主義議程的一部分，《新詞彙》一直在為一些舊時代的人物打廣告，比如三十年代古巴的反左翼 ABC 政治組織，一個著名的親美的古巴流亡記者、曾在波多黎各和邁阿密工作的報紙編輯 Carlos Castañeda。（該雜誌還重新發現了華特·迪斯尼在為兒童服務和普世文化傳播方面的突出貢獻。）

古巴政治中心的左派都去哪兒了？自從蘇聯解體引發的經濟危機以來，一種批判古巴社會各方面同時又忠於當局的自由共產主義思想就開始在國內的精英學術圈子當中傳播。《話題》(Temas)雜誌是自由共產主義的主要陣地，現已發展成為古巴最重要的社會科學人文期刊，其讀者包括知識分子、學者以及藝術家。它經常刊登一些內容豐富同時又富有批判性的文章，但卻又很少（哪怕間接地）對一黨制和黨的領導人發起質疑。

《話題》還贊助了一個每月一次的討論會，各種話題都可以在這裡討論，並且常年對公眾開放。然而自 2009 年 10 月 29 日著名的不同政見者 Yoani Sánchez 混進線上討論會並在會上發表具有爭議的言論以來，《話題》就對討論會的參與者設置了更為嚴格的審查機制。

《話題》雜誌的主編 Rafael Hernández 是一個精明的學者與政治推手，對於古巴民間大眾的情緒他總是有著敏銳的嗅覺。每當他感覺到民間的普遍不滿時，他就會在文章中適度地表達這種不滿，同時又將其控制在當局可接受的範圍之內。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寫給那些打算移民的年輕人們的公開信，在信中他承認對他們中的大多數表示理解，但在信的末尾又筆鋒一轉，就此事向當局巧妙地表達了自己的歉意。而在其他場合，尤其是面向外國讀者時，他的自由共產主義立場又成了當局脅迫下的一種偽裝。在墨西哥左翼報紙《每日新聞報》(La Jornada) 上發表的這一篇文章中，他捏造了一系列的詭辯，來為一黨專政、監禁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大眾權利的非民主體制辯護。

談到古巴國內左翼聲音的發展，領軍的人物大概有這樣幾位批評家，第一位是 Rafael Hernández，他依然忠於當局，但在自身政治操守與反叛精神的驅使下，也敢於不計代價地發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另一位批評家是 Esteban Morales Domínguez，一位經常出現在古巴重要政論節目“國際圓桌會議”(Mesa Redonda) (詳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sa_Redonda_Internacional) 上的美國問題專家。在其 2010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當中，他對古巴國內越來越嚴重的腐敗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相比內部的不同意見，腐敗給革命帶來了更多威脅。

他不畏於指出權力中心的腐敗圈子，甚至警告民眾政府正在鞏固自己的地位，一旦古巴陷入蘇聯解體一樣的動盪，他們就會以此來將國有資產侵吞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他的這一言論打破了禁忌。作為對其文章的回應，當局禁止他繼續出現在“國際圓桌會議”節目上，並將他開除黨籍。雖然後來他的黨籍又被恢復，但他卻不能再做電視評論員了。

Morales Domínguez 也曾撰文批判國內的種族歧視，儘管他還不曾碰過類似於“支持古巴黑人成立官方組織外的獨立組織”的敏感話題，但他最近也提了一系列相關的危險問題，例如體制內的種族歧視是否真的消失了，當局對於種族歧視的態度？他認為國內的種族歧視只是相對而言減少了，因為官方在反對種族歧視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民眾的期望還相去甚遠。

Morales 之後否定了體制內還存在種族歧視的說法，但他仍堅持認為由於缺乏政治決心和官僚主義帶來的障礙，政府在緩解種族歧視方面還沒有達到他們本應達到的目標。他還含蓄地表示，過去政府在應對種族歧視問題上的路線可以說是繼承自過去的資本主義與殖民政府，並且是只會維護自身的有缺陷的社會體制

的結果。這些缺陷還到處存在於國家體制的各級機構當中。

此外還有一些像 Morales Domínguez 一樣忠於體制，但卻因為自己的言論惹上麻煩的批評家。其中包括來自馬坦薩斯大學、經營了“古巴青年”博客(La Joven Cuba)的三位學者。這個博客建於 2011 年，宗旨是為了保衛古巴革命，同時促進對於古巴革命的現實與未來的思考。儘管該博客對一些不同政見的博主如 Yoani Sánchez 持強烈反對態度，但它為許多訪客（許多是古巴流亡者）提供了一個交換不同看法、意見的平台，並以一種謙遜的態度對這些不同看法進行評估。該博客的特色以及它對古巴官方馬克思主義、黨報《格拉瑪報》以及 2012 年黨的會議決議的遲遲未能實現的持續抨擊似乎是該博客被大學有關部門關閉長達 10 個月的原因。

三

古巴國內現在還成長著一股已經算是公開的批判性的左翼潮流。儘管他們不想被人貼上“不同政見者”的標籤，因為他們不希望人們把他們和自由市場經濟聯繫起來，更不希望被污衊為華盛頓的走狗——與這個標籤更符合的是古巴的右翼不同政見者，但他們仍然公開堅持著自己的批判立場。然而這已經突破了古巴官方的底線，在他們看來任何對官方的批判都是反動的。因此這些左翼的批評家遭受了官方的騷擾以及利益上的損失，例如他們可能就無法公費參加那些國外的會議了。就和古巴政治核心中的左派類似，這些左翼批評家主要是學生、學者以及藝術家，但他們也在試圖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參與到更多的公共事務當中去。這種批判性新左翼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以工人自我管理為中心的思想共識，這種想法對古巴的政治傳統而言還是新事物。來源不同但是偶爾相互合作的幾個團體在這個想法上達成了一致，由此便形成了最初的批判性左翼。其中一個團體是圍繞曾參加早期古巴革命的古巴前外交官佩德羅·坎波斯（Pedro Campos Santos）建立起來的，它試圖帶領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走向普遍參與的民主管理思路。批判性左翼當中最扎眼的團體莫過於“紅色觀察與批判”（Red Observatorio Critico），該團體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在政治上並沒有一個強硬的綱領，而只是一個主要由生態學家、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左翼天主教徒組成的鬆散的思想陣線。該團體一直致力於推進眾多議題的關注程度，例如環境問題、同性戀權益問題以及女權問題等，也許正因為如此該團體才經常被當局盯上並被監禁了很多人。

另一個比較活躍的團體是“彩虹計劃”（Proyecto Arcoiris），它致力於爭取同性戀解放，並希望在 Mariela Castro Espín（勞爾-卡斯特羅的一個女兒）領導的國家性教育中心（CENESEX）和“LGBT 權益觀察”之外另外建立一個獨立的組織，因為以上兩個組織都和克制、保守的 LGBT 權益反對者有著密切關係。

此外還有一個由古巴黑人建立起來的批判團體“黑人聯誼會”(Cofradía de la Negritud)，他們與“紅色觀察與批判”共同舉辦了一些突出表現黑人在古巴歷史當中所起作用的活動。其中有一次是為了紀念五個因為“褻瀆”班牙軍官墓而被八個白人醫學生殺害的 Abakuás (一種流行在古巴黑人當中的神秘信仰) 教徒。除了上述的一些努力之外，“紅色觀察與批判”以及批判性左翼當中的其他團體目前還尚未與主要的社會群體建立起聯繫，這也是右翼反對者同樣面臨的困境。官方的壓制、政府對大眾的束縛以及高度受限的網絡是絕大多數古巴平民都很少接觸到任何政治流派的批判性思想的主要原因。

四

不幸的是，對於地區自我管理的強調所帶來的副產品恰恰就是對於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的相對忽視，那個事實就是這是個無所不控、無所不在的一黨專政的非民主國家。

對於自我管理的討論總是傾向於忽略國家層面上計劃的重要性，以及只要依舊壟斷權力，古巴共產黨勢必會主導這種計劃。上世紀南斯拉夫的經驗表明局部地區的自我管理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同時滿足既有國家層面的經濟計劃，同時又不缺乏基層的民主參與。在對關鍵問題的決策上，包括積累與消費、薪酬、稅費、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社會服務，以及每個工作中心裡哪些規定可以通過，都需要新的權力結構來促進各方面的意見交換，以實現這種民主參與。

“紅色觀察與批判”的對於黨以及國家缺乏關注可能是受到不斷發展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無政府主義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古巴勞工運動當中曾經盛極一時，後來在 20 世紀 30 年代終於被共產黨領導的工會運動所淘汰。儘管無政府主義有著種種缺陷，許多當代的古巴左翼批評家還是轉向了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並將無政府主義視為一種光榮的政治記錄。

五

連卡斯特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古巴前進過程中的道德衰退與社會崩潰，而這些還不足以描述當今古巴政治與社會經濟體制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的全貌，在這種體制下，許多窮人和工人階級基本靠在國外打工的親人寄來的匯款維持生存，而他們當中有 40% 的人連匯款都沒有，對他們而言除了移民與作觸犯法律外似乎沒有別的生路。

隨著未來五到十年內曾經領導過革命的老一輩相繼過世，從那些政治矛盾集中的領域出發，古巴政壇將迎來新的政治圖景。有些人認為既然一種同時結合了

民主與革命特徵的社會主義還不太可能很快出現，就沒有必要提出這樣一種觀點。但這種對於一個民主自我管理的古巴社會的政治憧憬恰恰能夠向這種困局發起挑戰。通過團結起那些最弱勢的群體，號召階級、民族與性別的平等，未來的運動將會建立起一條團結的戰線，同舊有的、新型的壓迫者不屈鬥爭。

對於古巴人民和更廣闊的地域內同樣受壓迫的人民而言，希望就在這一願景之中。

Lehrer 譯

太平洋的風 校

本文轉自公眾號“海螺社區”（2016年3月19日）

原文鏈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01/the-cuban-revolution/>